
杨善洲故事

目 录

颂扬杨善洲的童谣.....	1
善洲箴言.....	2
寒门求学立志向.....	3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6
重病赴会不失约.....	8
账不能这样算.....	9
教师要以教书为重.....	11
让农民有知识.....	13
我不能搞特殊化.....	15
有个窝就行.....	16
开会不讲排场.....	18
帮助钉马掌.....	20
吃梨交钱.....	21
排队打饭.....	22
遮阳帽装糖果.....	23
保护清平洞.....	25
我们的总农艺师.....	27
凭真本事吃饭.....	29
三个女儿的婚礼.....	30
两块钱的存折.....	32
公车不私用.....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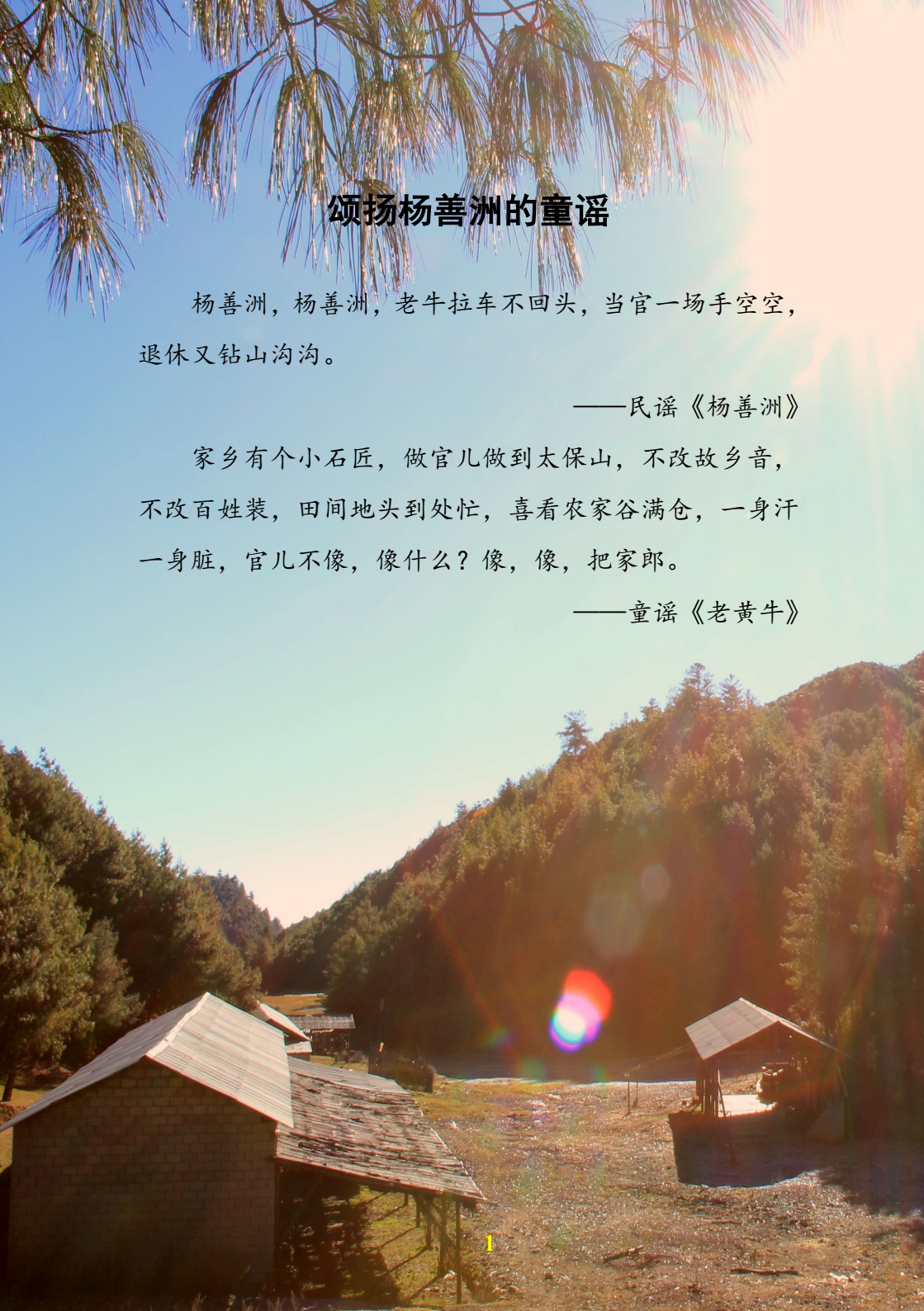


善洲故事



小枪的故事.....	34
为“偷猪贼”平反.....	37
徒步走三乡.....	40
两根香肠的年夜饭.....	42
不能让百姓饿肚子.....	44
我们自主当龙王.....	48
总书记盛赞杨善洲.....	51
做实事的人我敢用.....	54
治穷先种树.....	56
抉 择.....	60
火塘会议.....	63
扎根亮山.....	66
麂子肉风波.....	69
不能向困难低头.....	70
大街上捡果核.....	72
杨善洲的民间封号.....	76
表 率.....	81
老书记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5
丹心映碧岭.....	88
附：	91
杨善洲同志简历.....	91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is a scenic landscape.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several traditional houses with tiled roofs. A river flows through the middle ground, surrounded by lush greenery. In the background, there are steep, forested mountains. The sky is clear and blue.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peaceful and rural.

颂扬杨善洲的童谣

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
退休又钻山沟沟。

——民谣《杨善洲》

家乡有个小石匠，做官儿做到太保山，不改故乡音，
不改百姓装，田间地头到处忙，喜看农家谷满仓，一身汗
一身脏，官儿不像，像什么？像，像，把家郎。

——童谣《老黄牛》

善洲箴言

1. 解放 30 多年了，还叫他们挨饿，是我们当领导的对不起他们啊！

2. 群众思变，群众想富，我们还能拖后腿吗？

3. 工作岗位可以退休，但共产党员的身份不会退休，为人民服务就不会退休。

4. 我手中的权利是党和人民给的，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

5. 孩子的路，靠他们自己走。

6. 我的石匠工具，你要好好收起，以后我不当官了还要靠它吃饭的。

7. 六十岁是人生新的开始。

8. 过日子，吃处有个锅，睡处有个窝就行了。

9. 父老乡亲给我的，我一辈子也还不清！

10. 不懂得报恩的人简直就不是人。

11. 我有一个观点：先造林子，后盖房子。



寒门求学立志向

1927年1月4日，一个小男孩在姚关镇陡坡村大柳水刘家山头一户贫苦的雇农家中呱呱坠地，他就是日后备受

家乡人民称道和爱戴的杨

善洲。父亲杨发龙，朴实厚

道，乐于助人。母亲席有娣，

心地善良，勤俭持家。杨善

洲兄弟姊妹6人，在那个缺

医少药的年代，有4个孩子

都夭折了，仅杨善洲和妹妹

杨善珍活了下来。由于吃不

饱穿不暖，小善洲经常生

病。父母为把他抚养长大，

按当时家乡习俗，把他过寄

给当地一位名叫马莲的妇女，认她作干妈，干妈给他起了

寄名“马桩”，希望为杨家拴住这一根独苗，后来乡亲们

都叫他“小马桩”。

杨善洲的童年，中国政治黑暗，内忧外患，人民生活



疾苦。他的家乡大柳水更是贫困落后，加之出身雇农家庭，年幼的杨善洲饱尝贫困之苦。小小年纪的他立下了志向：无论如何，一定要读书，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及家人的命运；通过读书，改变家乡的面貌。然而，一个雇农家庭的孩子要想读书谈何容易，家中吃了上顿无下顿，父母常常为揭不开锅发愁。父母虽有心供他上学，却拿不出钱来。贫寒少年的志向和执着深深打动了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寄母马莲。马莲是一位草医，乐善好施，在当地小有名气。看到小小年纪的杨善洲懂事明理，有志向，认定他将来必成大器。于是，便把杨善洲接到身边并送到附近的私塾读书。寄母的无私善举圆了有志少年的读书梦，并对他日后优秀人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杨善洲和母亲的合影

上私塾后，杨善洲对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十分珍惜，读书非常用心。常常带上一个玉米粑粑或几个烧土豆就是



一顿午饭，有时还饿着肚子坚持上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放学后他就帮着父母打柴割草，晚上回家挑灯苦读。三年后，寄母又把杨善洲送到陡坡村大坪地席文儒老师的私塾进一步学习。席文儒老师的私塾离外婆家不远，他白天到学堂读书，夜晚住在外婆家里。外婆心疼外孙，就给了杨善洲家两亩半山地，于是，他一边读书还一边种地。杨善洲在席老师家又学了三年，品学兼优，深得席老师喜欢。

杨善洲是姚关人，从小就听到许许多多关于明朝抗缅名将邓子龙的传说，对他无比崇敬。在席老师这里学习期间，同样对邓子龙将军满怀敬意的席老师又给他讲述了史书上记载的一些故事，领着学生到大关、小关、清平洞等邓子龙作战、驻扎的遗址凭吊，并抄录清平洞石壁上雕刻的邓子龙诗歌。席老师的教育，使杨善洲对这位名将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暗暗立誓，将来也要做邓将军那样的人，为国效力。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杨善洲 16 岁那年，父亲染病，无钱医治去世。为了抚慰伤心的母亲，帮她分担家庭的重担，杨善洲离开私塾，回到了家里，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杨善洲非常能吃苦。种地、割草、喂猪、打柴、竹编样样能做。然而，一家人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的。

“天旱三年，饿不死手艺人。”母亲决定让杨善洲拜姚关董龙村杨有和为师学石匠手艺。杨善洲学得很好，石匠手艺仅次于师傅，人们都叫他“二石匠”。他为人厚道，从不对人起坏心。力气又大，帮人砌石脚、盖房子都很卖力。丢土坯时别人两只手丢一个，他是一只手丢一个。他们经常到永德县鲁家寨一带做石活，还远到缅甸麻栗坝帮人砌石脚。那些地方的人都很喜欢杨善洲，有一次有一家人还送



了他一套衣服。

1942年春夏之交，日本侵略军攻陷缅甸后，立刻把战争魔爪伸进滇西，妄图沿滇缅路长驱直入，攻战云南，威逼重庆。战火烧到了家门口，杨善洲义无反顾地参加到支前民工队伍中去，为远征军运送物资、抬伤员、修桥筑路，直至1945年初滇西反攻胜利。



重病赴会不失约

1951年9月，杨善洲在原保山县第五区西南乡（今施甸县何元乡石头寨村委会）开展土改工作。有一次，与篱笆寨、甘蔗地两寨的群众约定开会。可是到了约定时间，他感染了疟疾，高烧不退，外面还下起了大雨。看到这种情形，同志们建议由其他人代他去开会。他却坚决不同意：“我是西南乡土改工作组的组长，已经和群众约好，就要亲自去，哪能不守信用？”他穿起草鞋，戴上竹叶帽，身披蓑衣，手拄拐杖，尽管泥滑路烂，还是走了六公里的崎岖山路，来到甘蔗地、篱笆寨和群众一起开会。他言而有信、从不失信于民，深深地感动了身边的同事和当地群众。事隔近60年后，当地的群众依然没有忘记这位信实的干部。



账不能这样算

1951年，杨善洲在原保山县第五区西南乡（今施甸县何元乡石头寨村委会）搞土改时，有半年多在姓安和姓李的两个老乡家吃饭，每顿饭要交1角钱的伙食费（他当时的月工资是10元）。杨

善洲每个月都按时结清伙食费，还与这两家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临走时安家少收了他最后两顿饭钱。在保山培训期间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时，杨善洲主动汇报了这件事，并做了自我检讨。培训结束后，他被调到了第五区席子乡（今施甸县甸阳镇沙坝脚村委会）工作。一天，他走了近百里山路，将写好的检查连同所欠的两角钱亲自送到这一姓安的人家，并对他说：“按照我们党的政策，我应该把伙食费结清。如果你们不收这两角钱，组织上就会处分我。”姓安人家听了后，担心他受处分，才收下了这两角钱。



1984年5月，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和秘书段兴华到陵川县出差。在县委食堂吃饭，段兴华去结账时，县委书记说：“这顿饭我请客。”段兴华就没有付钱。在他们驱车返回保山途中，老书记问：“伙食费结了吗？”段兴华如实回



答：“没有。”老书记立即喊道：“停车！回去结账。”段兴华回来后和老书记说：

“总共结了6元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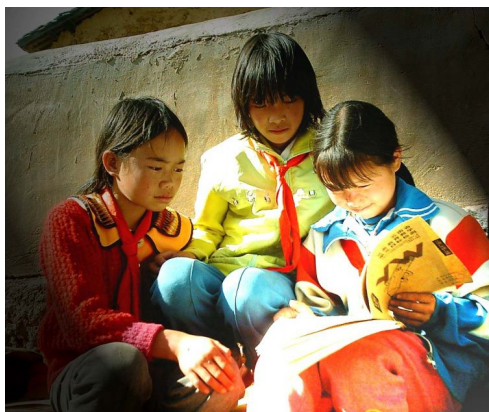
角的伙食费，来去两百多公里路，车费就花了22元。这一趟真不划算。”老书记语重心长地说：“账不能这样算！我们机关干部下乡，这里吃一顿那里吃一顿，拍拍屁股就走，谁来付帐？最后还不是摊到老百姓身上！”

段兴华明白了，老书记算的是共产党员的作风账、领导干部的纪律账啊！



教师要以教书为重

解放后，陡坡村的孩子要到十几公里外的姚关清平洞小学上学。由于路途遥远，孩子们夜里四五点钟就起床，带一包冷饭，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才到学校，下午3点多



又赶着回家，每天往返要走四五个小时。

特别是冬天的早上，伸手不见五指，又黑又冷，山间林子还常有豺狼出没，不少家庭怕出意外，就让孩子辍学在家放牛玩耍。这个问题怎么

办？1960年，当时任保山县副县长的杨善洲专程找到姚关清平洞小学校长计盈，研究如何解决陡坡村学生入学难问题。计盈建议在村上办一所民办学校，避免学生来回奔波。杨善洲回到陡坡村后带头捐资，乡亲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久，就建成了一所简陋的民办小学，那些失学的孩子又高高兴兴地回到了课堂。

六十年代，学校在教育教学中过分强调劳动教学，导致学校教师教学任务无法完成，学生成绩普遍下降，整个



教育处于混乱之中。同时，掀起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各行各业纷纷下乡支援，教育也受到影响。时任施甸县委书记的杨善洲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多次开会研究，最后县委作出决定：全县教师要以教书为重，不参与支农活动。要认真贯彻教育方针，教材必须上完，练习必须做完，作业全批全改。全县教师能潜心教学，学生能安心读书，学校教学秩序井然。

杨善洲还要求各村要划出一定的土地给学校做生产基地和活动场所。1964年，施甸城郊的38所公立小学，平均每班有地一分五以上。后来，杨善洲下乡调查到学校的操场、校舍、生产基地经常被生产队和社员占用。他指示：为确保教学的正常开展，生产队要尽量方便学校，已占用的学校操场和生产基地要退还给学校。

针对贫困学生无法上学的实际，他要求县财政设立助学金，每生每学年补助2元。很多学生就是靠这笔助学金完成了学业的。许多老师都由衷地说：“老书记如此重视教育，我们一定要教好书、育好人，让施甸子弟有文化，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



让农民有知识

杨善洲任施甸县委书记期间,为了尽快普及小学教育,解决农村,特别是山区孩子普遍无学上的问题,在全县积极创办半工半读的简易学校。施甸县共创办简易小学 505 所,就读学生 15020 人。为了让更多的农家子女接受教育,

杨善洲倡导在各公社开办农业中学来培养人才。1963 年,施甸县第一所农业中学在银川何家



寺(今县委党校址)开办。随后,在太平、水长、由旺等地开办农业中学 16 所。农业中学为施甸建设输送了一批急需的人才。为了扩大教育面,1966 年 5 月,施甸县开办了红专学校,并将农业中学并入其中。主要招收初中毕业生,实行不包分配、社来社去、学习费用半自给、半工半读的



办学原则，当年招收学生 500 人。

当时，施甸 80%的农民都是文盲。面对这样的现实，1963 年，施甸县开展了一场以“识文断字”为主要内容的扫盲运动。“富人读书，穷人喂猪，我们主要就是盘田种地，学



不学文化都不重要。”针对这种想法，杨善洲在各种会议上，都教导大家：“生产经济发展的根本

就是教育，农民有知识，生产才发展，生活才进步。”激发了群众的学习热情。群众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提着马灯、拿着纸笔自觉地参加学习，一年就有 1400 名群众脱盲。



我不能搞特殊化

杨善洲在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期间，经常在县委机关食堂吃饭，并且带头上交伙食费。有一次，食堂工作人员多加了一个肉。他就说：“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怎能心安理得吃肉？” 1960年，任保山县副县长的杨善洲来到姚关区尖山大队。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严重缺粮。社员吃饭都是等生产队“大食堂”煮好稀饭，再煮一锅洋芋、南瓜和野菜称给大家吃。杨善洲到那里后，大队支部书记戴绍凯吩咐食堂煮白米饭，杀只鸡招待他。杨善洲立即拦住说：“现在老百姓都在咬紧牙关战胜困难，你招待我好吃的，我怎么咽得下去？大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不能搞特殊化。”开饭了，他打一份饭菜，和大家蹲在一起吃，一边吃一边聊：“今年包谷长势咋样？家里有什么困难？……”饭后，他坚持将粮票和钱交给大队会计。对于大家的劝阻，他还是那句老话：“我不能搞特殊化！不能当白吃干部。”



有个窝就行

杨善洲任施甸县委书记期间，一直住着土木结构的瓦房，一半是办公室，一半是卧室。由于年久失修，有的柱根已近糟朽，陈旧的墙壁斑痕点点，地面的小四方砖，每到雨季就泛潮，窗户也裂了缝。在这冬天刮风、夏天漏雨的小屋里，他一住就是4年，还患上腿病和腰病。工作人



员多次提出要给他修修房。他说：“人嘛，住处有个窝就行了，这比起农村的草房好多啦。”

1985年，保山地委机关正在建盖一栋办公大楼，昌宁县金华乡发生水灾，得到消息后他连夜赶往灾区视察灾情、指挥抢险救灾，回来后马上做出决定：地委正在建盖的办公大楼立即停工，资金用来救灾。当时，许多人都想不通，认为可以



从其他地方调动资金，没有必要正在建设的办公大楼停工。

有一位领导在他面前表达了这样的想法，他激动地说：“如

果眼看着人

民群众在受

苦，我们却

安逸地坐在

这么富丽堂

皇的大楼里

悠闲地办

公，你不觉得有愧吗？”



开会不讲排场

1956年，任保山县县委副书记的杨善洲从保山城到姚关调研。他给姚关的小学教师作了一次报告，没有秘书撰写的发言稿，他结合施甸的生产生活状况，在清平洞前草坪上，站着就讲了两个小时的秋收秋种工作，他声音洪亮，情真意切，语言朴实，有条理有层次，尤其是对农业生产的熟悉给老师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64年初春，任施甸县委书记的杨善洲到



杨善洲同志在全区三千会上作报告

施甸中学作报告。会场设在芒果树下，学校用两张学生书桌连起就是讲台，学生条凳摆成听报告的会场，讲桌上铺一条绒毯，摆一架马蹄钟，一瓶鲜花。杨善洲提前来到会场，手指着讲桌上的摆设，对布置会场的人说：“不要搞花



花绿绿的形式，要务实求真守本分。”负责会务的人员只好收起花瓶和座钟，仅存一条毯子，他才满意地坐在三档椅上作报告。从此，县委会议主席台上看不到鲜花和座钟。随着事业的发展，县委礼堂竣工，设备渐次完善，讲台上也仅摆一杯绿茶，台下放一瓶热水。



帮助钉马掌

施甸建县后，运输条件差，大量的物资运输要靠马车，马车成了人们赶街上城的主要工具。



一天午饭后，杨善洲要到施甸街市看看。施甸大食堂前有位赶马车人想钉马掌，无人相助，难于操作，正在发愁，一抬头看见杨善洲从进街小道走出，急忙喊：“同志同志，帮个忙！”“有什么事？”“帮我端马脚。”“好！我来端。”杨善洲走过来，伸手端住马脚，摆出弓箭步的架势，

把马脚放在自己膝盖上稳住，赶马车人从布袋中取出钉与掌，两人配合默契，齐心协力，先割马蹄后钉掌，半个小时功夫钉好了马掌。杨善洲拍拍手上和裤子的灰，向施甸街大桥头百货公司方向走去。在钉掌时又来了一个过路人，待杨善洲走远后，问赶马车人：“你知道帮你钉马掌的人是谁？”“不知道。”“他是施甸县委书记。”“哦，他就是杨善洲！一点官架子也没有，真是一位难得的好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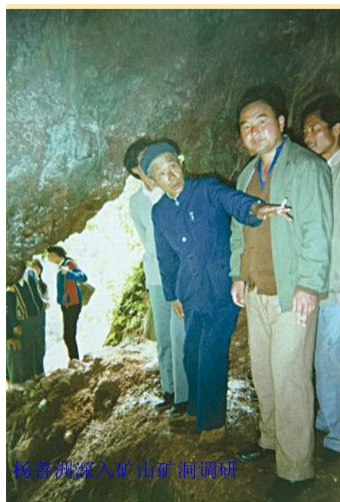
吃梨交钱

有一次，杨善洲和杨秘书从银川街走路回保山，沿古永昌郡第三条“五尺道”保场驿北出，来到关索岭坡栗柴寺生产队，两人已经汗流浹背。生产队长和群众见老书记来到，分外高兴。拉家常、谈生产、讲果树，亲热得像家里人。这时，一个社员提着一筐梨进来，交给队长分发。大家你一个我一个吃得特别开心。队长说：“喝水不忘挖井人，吃梨不忘老书记。梨是老书记帮队里嫁接的，老书记和杨秘书一定要多吃几个。”在场群众都吃到老书记嫁接的梨，汁多肉嫩、甜脆可口，确实好吃。休息一阵后，杨善洲和小杨要赶路回城，他吩咐秘书：“我俩吃的梨按实价付款。”队长和社员执意不收。他说：“解放军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旧社会的官还讲秋毫无犯。我俩不能沾社员的便宜。”队长没办法只好收下秘书交的梨钱。



排队打饭

杨善洲任地委书记时，每次到施甸调研，从来不许县政府设宴招待。用餐都安排在县政府食堂。一日三餐，早餐酸辣面条，中餐和晚餐大米饭，每天伙食费肆角。食堂开饭钟声一响，杨善洲便拿着碗筷，和政府机关干部排队打饭。大家都认识杨善洲，他是上级领导又是老同事，他一到饭堂院场，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谈笑风生。大家都想让老书记先打饭。杨善洲满脸微笑地说：“纪律要靠大家遵守，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先吃后吃总是吃，我有什么权利特殊。”有时他排队靠后，打好饭已经没有空座位。大家争先让座，他就说：“坐着吃蹲着吃还是吃。”他就蹲着烤太阳吃饭，边吃边和大家聊天。吃完饭，他总是就着饭碗到锅炉前接开水喝。他说：“不要浪费，碗边沾着油分子，开水冲冲，统统下肚，增加营养，热量多干劲足。”逗得大家乐呵呵的。





遮阳帽装糖果

有一天中午，杨善洲走出地委机关大院，上街转一转，保山城人来人往很热闹。他走进糖果公司，买了一斤糖，售货员不给包装纸。怎么办？他伸手取下遮阳帽，让营业员把糖果倒进帽子里。



杨善洲与各县区签定责任书

他心中总在想包装纸问题：群众上街购物，有城里市民，有乡下农民，不管何人，买了物品，要有包装才方便携带。刚才发生的事，他认为是在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有问题。他返

回机关，告诉秘书通知各处局委办领导立刻到地委会议室开会。不一会儿应到会人员到齐，准备开会。他开头说：“先吃糖后开会。”到会的领导猜不到他葫芦里装什么药，一时间交头接耳起来，气氛活跃，抽烟喝茶吃糖倒是很轻松，一会儿就把糖吃完了。



杨善洲心情沉重地开始讲话：“大伙吃了糖，糖是装在帽子里带回的，卖糖没有包装，怎么带走？这不是小问题，说重一点是为人民服务的态度问题，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为人民服务不是空喊口号，为群众办事要实实在在，要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希望各机关单位引以为戒。问题在下面，根子在领导，不要批评办事员，改变领导作风才是关键。”



保护清平洞

姚关清平洞是明代参将邓子龙万历年间抗缅平叛的军事指挥部遗址，“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重破坏。保山“三杰”碑之一的《恤忠祠记》碑右下角被砸毁，李根源题《邓将军烹象处》碑上端被砸掉，恤忠祠四合院木雕遭铲除，磨剑亭、看山亭被彻底砸毁。

粉碎“四人帮”后，对这个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恢复重建工作引起了地委和县委的高度重视。几经协调，省文化厅图



博处首先拨款，地、县两级文化部门认真实施了修复保护项目。到1980年，历经三年修缮的清平洞焕然一新，重现风采。但是保护清平洞最关键的设施——围墙经费却没有着落。施甸县文化馆馆长程荣芳在摆榔乡搞民族民间文学调查时，恰好遇到了到摆榔乡搞民族工作调研的杨善洲。

一天晚餐后，杨善洲邀程荣芳步行回姚关，约好次日早上去清平洞看一看。第二天早上两人8点半钟同往清平

洞，程荣芳边走边向他汇报清平洞恢复重建情况。到达清平洞，他仔细巡视一遍，又问存在什么困难，程荣芳如实汇报了围墙建设资金问题。杨善洲说：“保护清平洞重点是围墙，要把围墙向南延伸。保护好那几棵果松。栽树不容易，被人砍掉太可惜。学校老师要认真加以保护，文化馆有责任管理好。”不久，地委研究决定，拨给清平洞修缮经费二万元。程荣芳欣喜若狂地向杨善洲表达谢意。老书记淡淡地说：“这是地委集体讨论决定，我只是地委委员之一，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围墙建成后，杨善洲亲手在清平洞前种下雪松。还把在地委机关宿舍前自己种的紫薇、玉兰、铁树等 30 余盆花木送给清平洞。

清平洞荷花池





我们的总农艺师



文革后，保山地委的工作主要是解决吃饭问题，杨善洲为了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抓稳、抓实粮食生产，带领农业和林业部门的技术骨干在保山板桥、施甸保场、昌宁潞水等地建立了粮食生产样板，坝区搞“三熟”样板，种植早稻、中稻、晚稻。保山坝、施甸坝的水稻单产历史性地跨越了千斤大关。在保山的北汉庄、施甸的李山头等山区搞包谷样板。



那时老书记在保山县板桥公社、施甸县保场公社都有半亩个人样板田，施甸的李山头、姚关都有包谷样板地。他的车上经常放着锄头，下乡见到不规范的栽插现象，就要亲自下田、下地去手把手的示范。他的随身物品中总有一把嫁接刀，车里经常放着“萝卜保鲜法”贮藏的良种果木枝条。看到群众家里的果树缺乏科学管理就帮助修剪嫁接，还手把手教授管理技术。为官三十载，经他亲手嫁接过的果树至少有几万棵。当年的农科技术员都由衷赞叹：“他真可以算是我们保山农业生产的总农艺师！”





凭真本事吃饭

1976 年秋，施甸地震，北京来的抗震救灾医疗队到姚关，去了大柳水杨善洲的老家，帮他的老母亲做体检。看到杨善洲书记家的房屋与周边居民的房屋没有什么两样，就是一幢瓦楼房，厢房还是竹笆墙。北京医疗队的医生说：

“太奇怪了，还没有见过地师级干部家属还是农村户口，家属住的是这样的房子的。”



有人问杨善洲：“您咋不安置您的子女工作？”他说：“农村人就是农村人，要凭真本事吃饭。如果我安置、提拔了他们，会影响党和人民的事业。”杨善洲多次压下了家属子女的“农转非”报告，二女儿 1985 年考上公办教师之前，全家 9 口人只有他是城镇户口。



三个女儿的婚礼



1968年，杨善洲的大女儿杨惠菊结婚，杨善洲寄回来30元钱，并嘱咐老伴不准请客，不准收礼。寨邻亲戚凑了45元，勉强帮着把婚事办了。

1985年，二女儿杨惠兰结婚，杨善洲也没能来参加婚礼。一年后他才抽空到了杨惠兰教书的学校，看到女儿用



春城牌香烟的纸箱装小孩的尿布、衣服，就给了女儿 100 元钱。杨惠兰用这笔钱请人做了一个衣柜。因工作调动，杨惠兰搬了几次家，但这凝结着父爱的衣柜始终陪着她。

1993 年，在保山烟草公司工作的三女儿杨惠琴结婚。尽管时代不同了，但杨善洲还是叮嘱女儿婚礼从简，少请几桌，并给了女儿 1000 元钱。婚宴是在保山宾馆举行的，酒席没有超过 10 桌。这次，杨善洲穿着干净的蓝色中山装参加了小女儿的婚礼。没有前呼后拥，没有奢华阔气，他静静地坐在角落里，慢慢地吃饭，只有脸上绽开的笑意，才显出他是婚宴上的一个重要角色——幸福的新娘的父亲。



两块钱的存折

2004年，有几个人与老书记在一起闲谈，其中一人问：“您的存折有多少钱？”他说：“有两块。”又问：“大块还是小块？”他说：“就是两元。”那几个人都很疑惑，在他们看来，一个参加工作50多年，担任地县领导30年的人会那么穷？事实上老书记花钱从来都是撒手得很的，只是用来帮助别人时候多，怎么会有多余的钱来存呢！60年代，他在大官市蹲点，看到一家农户没有钱买耕牛，就掏钱给该农户买了一头耕牛。看到农户想养蜜蜂但是没有钱做蜂箱，就把他半年的出差费400多元钱给生产队买木板做蜂箱。他到大理出差，看到那里的雪梨好吃，就自己掏钱引进了一批大理雪梨苗，栽给了大官市的群众。他从来没有穿过名牌，谁也看不出他是一个大干部。他60年代穿草鞋，70、80年代穿胶鞋，90年代后期才穿上皮鞋。有一次，他到昆明开会，在街上逛商店时让服务员拿一顶帽子，服务员看了看他说：“那是毛呢帽呢！”他肯定地说：“我看中的就是这顶。”于是买下了这件他一生唯一的奢侈品。



杨善洲干劳动时穿的黄胶鞋



公车不私用

杨善洲任地县领导 20 多年，按规定配有专车。他有条规矩：公车不私用。他说到做到，言行一致。

杨善洲和杨茂春是工作上的好搭档，先后在施甸县委、保山地委书记、副书记。两人感情深厚，配合默契。杨茂春常讲起杨善洲公车不私用的趣闻。有一次杨善洲回姚关老家。杨茂春说：“我告诉小车班派车送你。”杨善洲就说：“那我就不回家了！”杨茂春只好说：“好好好，我让秘书到客运站买票。”杨善洲就接上：“好嘛，我明天早上回家。”杨善洲小女儿杨惠琴在保山读书时，他到施甸下乡、工作后返回保山，车内只有他和驾驶员，其余座位空着，也不让女儿坐公家的车返校。平时都是掏钱给女儿乘客车往返施甸保山。



小枪的故事

从昌宁卡斯方向驶来一辆沾满尘土的吉普车，在通往湾甸的土路上颠簸着，来到傣族寨子边，停住了，从上面下来四个人，走在前面的一个中年男子戴着一顶大竹叶帽，穿着一身发白的蓝布中山装，脚蹬一双麻线草鞋。他们顺着窄窄的田埂一路查看，在微风中不时停下，捏捏庄稼，扒扒泥土，表情凝重。

人们常用“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来形容高原的天气变化无常，



可是，湾甸的气候变得更快，刚才还是晴空一片，眨眼之间就大雨倾盆，雨夹着风，风助着雨，大点大点的雨水砸在人的身上有点儿生痛。这几个人赶忙向公社跑去，还没到门口衣服早已经湿透。大竹叶帽说：“我们到里面去避避雨，烘烘衣服。”他们到了公社的厨房，脱下湿漉漉的衣服，



稍微拧了一下就围在灶门口烘起了衣服。厨房的师傅不客气地说：“你们几个怎么到处乱跑？出去！”大竹叶帽说：“我们是过路的，下大雨把衣服淋湿了，又没有衣服换，来你们这里避避雨，烘烘衣服。”师傅说：“这里是公社的食堂，不给闲人进来，你们赶快走！再不走我就去告诉书记了！”大竹叶帽央求说：“师傅，行行好嘛，我们衣服烘干就走。”师傅看他们没有走的意思，就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是谁在这里赖着不走？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一个声音大吼着，大家循着声音方向看去，只见低矮的厨房门被一个矮胖的男人堵得严严实实。大竹叶帽小心地说：“同志，我们衣服淋湿了，没有换的衣服，只好到你们这儿烘一烘，烘干了我们就走。”胖男人不耐烦地说：“你这个老贼怎么说不通！”随即，拔出手枪指着大竹叶帽，瞪着眼睛说：“还不快滚。”

大竹叶帽把正在烘着的衣服递给身边的年轻人，迎着胖男人的枪口慢慢直起身，盯着他，冷冷地说：“共产党发给你枪是让你对付坏人的，怎么能用它来对付老百姓？枪，我也有。”随即，从腰间掏出一把亮闪闪的小枪。胖男人一看，大吃一惊，这是最新式的六四式手枪，整个保山地区



没有几个领导有资格配这种枪。马上脸色铁青地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眼不识泰山。”大竹叶帽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辉x x。”“哦，你就是湾甸公社党委书记辉x x。”胖男人嗫嚅着说：“我就是，我就是。”大竹叶帽严厉地说：“即使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到了公社，口渴了，你应该泡给他一杯热茶；肚子饿了，你应该热点饭招呼他。这是人之常情啊。我们衣服淋湿了，到你这儿烘烘衣服没有妨碍你们工作呀，怎么能把党发给你对付坏人的枪，随便就掏出来吓唬人呢？明天中午12点，你到昌宁县委来。”

第二天下午，一个轰动县城的消息传开了：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到昌宁调研，在县委主持开会，撤消了湾甸公社党委书记的职务。



为“偷猪贼”平反

1986年，保山汉庄宗家山有个叫杨春兰的妇女，勤劳能干、脑子转得快，平时搞点儿猪生意，小日子过得不错。家里有两个女儿，一个比一个漂亮，村子里的人们都非常羡慕她。

有一天，她从水寨买了一头猪回来。半路上被几个陌生人拦住，其中一人说：“这头猪是我家的，一定是你从我家偷来的。”杨春兰解释说，猪是她跟另外一个人在水寨街市上买的，她没有偷过他家的猪。双方相持不下，猪主人便报告了沙坝派出所。派出所民警调查证实这头猪确实是他丢失的，决定没收杨春兰买的猪，并罚款80元钱。

“杨春兰偷猪”的事很快传开了。各种议论沸沸扬扬，有人说：“难怪会富，原来是专门偷猪卖。”有人说：“平时装得老实，其实肚子里有鬼。”更有甚者，嗤之以鼻：“孔雀漂亮，可是孔雀屎有毒。偷猪贼的女儿哪家敢要啊。”杨春兰一家听到人们的议论，哭成一团。她觉得一定要讨一个说法，还自己清白，就请人写了一个申诉材料寄到保山地委。杨善洲看到了立即批示“认真调查此事，把结果报本人。”



地委办公室指示在汉庄的工作组调查此事。同时，信访局也派人下来做调查。调查了 20 天，终于把这件事弄清楚了。事实查清后，地委专门安排了一位地委常委、地区公安局长、保山县公安局长等 15 个人参加处理，并把此事写了一个详细的情况通报报告杨善洲：猪是偷来的，但不是杨春兰偷的，是另一个人偷了猪到水寨街上卖给杨春兰的。派出所把错罚杨春兰的 80 元钱退还了她，并向她道歉。

两个月后的一天，地委警卫报告杨善洲说，有一个妇女提了一包东西要见他。杨善洲正在开会，便派秘书苏加祥去接待，苏加祥到门口一看，原来是杨春兰。问她来干什么？怎么还提了一包东西？她说，她要找杨书记当面磕头感谢。因为她有两个女儿，一个 24 岁，一个 22 岁，模样长得很漂亮，可是没人来提亲，因为她们是“偷猪贼”的女儿，而农村非常忌讳这种名声不好的人家。是杨书记派人查清真相，还了她的清白。今年，她的两个女儿都有人来提亲了，马上要成亲，这对她们家可是天大的喜事呀，所以她一定要来谢谢杨书记，当面磕头感谢。苏加祥告诉她说：“杨书记很忙，正在开常委会。另外，他也不会收你的东西。”杨春兰着急地说：“我只是拿了给他一点儿山蘑



菇，还有3包包谷，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无论怎么解释，她就是非要见杨书记，苏加祥拗不过她，只好叫她等着，他到楼上把杨春兰的来意报告了杨善洲。杨善洲让苏加祥下来问一问杨春兰，对处理结果满不满意？还有什么要求？如果没有，就让苏加祥派车送她回去，东西不能收。苏加祥下来把杨书记的意见转达给杨春兰，杨春兰连声说：“满意满意，没有什么要求了。”苏加祥说：“那好，你满意就好。杨书记正在开会，没有时间见你了，你请回吧。东西，杨书记不收，还是请你带回去。”杨春兰对着办公楼磕了一个头，哽咽着说：“谢谢青天杨书记。”



徒步走三乡

1982年，杨善洲为了掌握保山地区的土地承包工作的第一手资料，他来到施甸的保场公社，对驾驶员说：“小赵，我要到处看一看，你等着我，如果到天黑不见我回来，你自己去找吃住。”老书记戴上大竹叶帽，下了车向地委样板田走去。小赵等到天黑，又渴又饿也不见老书记的身影，于是驾车到了施甸县城，在县城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

到大桥头老食堂买了两个包子，又开车回到保场。眼看太阳偏西，始终不见老



书记，他有些急了，找到了老书记的样板田，遇到一个老汉，急忙问：“大爹，你见过一个戴大竹叶帽穿黄胶鞋的人吗？”老汉望望小赵：“哦，是不是姚关口音的那个老头儿？”

“就是他，你见他去了哪里？”

“他问了一些种庄稼的事，卷了支草烟就走了。我约他



到家里吃饭，他说要去东山。”

小赵返回车旁又等到天黑，还是不见老书记。只好忍着饥饿到了县委会，向县委办公室值班员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请求帮助打电话到老麦公社询问。老麦公社的同志回答说：“他来过，我们不知道他是地委书记，还以为是串亲戚的人呢。他喝了一杯水就出门了。”小赵又回到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县委会办公室问，老书记仍然没有下落。县委值班员打电话向东山片区所有公社、大队询问。直到中午，木老元公社回电话说老书记到了那里。木老元是历史上施甸最贫困的民族山区，交通不便，距离县城40多公里。老书记从保场到老麦，又走到木老元，不知走遍了多少个大队，走访了多少户人家，走了多少里崎岖山路，恐怕只有他才知道。小赵和县委办公室的值班员，接了电话就沿着木老元方向去接老书记。走了十多里路，才在四大山的石门坎遇上了老书记。他还是头上戴着大竹叶帽，灰色的裤子，裤脚沾满灰土，那双褪色的黄胶鞋也沾满了泥巴。小赵担忧地说：“老书记，你急死我了。”“大男人担心什么，别让人笑话。我不是好好的嘛，”老书记笑着说。回保山的路上，小赵看老书记脸上一直露着笑意，他想：“我担惊受怕了一回也值了，老书记一定有了许多收获。”



两根香肠的年夜饭

杨善洲担任地委副书记后，地委在施甸县大官市公社建起了 500 亩的林果基地，以种新疆核桃、红花油茶、梨等品种为主。杨善洲经常到基地去调研指导、参加劳动。70 年代的一个大年三十，他兴冲冲来到地区林业局，约了后来任林业局副局长、林业总工程师的吴学潮到大官市基地。原来他到大理出差采集到富源黄梨、苍溪雪梨两个良种果苗枝条，为了保证成活率要赶紧去嫁接果苗。两人乘车来到大官市，吴学潮帮书记提起包就爬山上基地。路上打开包一看，嫁接剪刀、削切刀、薄膜、枝条，一应俱全。与自己带的专业嫁接工具并不差多少。还有一双草鞋。到了基地，两人取出萝卜保鲜的良种枝条，选砧木、削芽条、包扎切口、修剪果木，两人驾轻就熟地干了一整天。傍晚时分，两人才下山回到大官市供销社。





杨善洲拿出铜锣锅、大米、洋芋、白菜，开始生火做饭，饭做好了，他像变戏法一样从包里拿出两根香肠。告诉大伙说：“今天是大年三十，年夜饭要改善伙食哟！”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后来驾驶员对老吴和供销社值班员说，像这样的革命化春节，这些年跟杨书记过了不少。



不能让百姓饿肚子

杨善洲出身雇农，旧社会没有半分土地，受尽缺衣少食的苦难。新中国成立后，他家分到了五亩地。杨善洲不忘党的恩情，对党、对农民、对土地有着一种深厚的感情。1966年至1986年担任地委主要领导20年间，他对保山的粮食生产特别重视，他曾多次在干部会上讲：“我们是党的干部，如果老

百姓饿肚子，我们就失职了。”1966年起，他带动推广了“三尺两面沟，两季夺丰收”的山地



种植技术。保山地区的玉米、小麦增产了2倍。粉碎“四人帮”后，尽快恢复农业生产，解决农民的温饱成了地委工作的头等大事。为了抓好粮食生产和推广机械化耕作，保山地委作出了坡改梯、改条田、改籼稻为粳稻、种绿肥



红萍改良土壤、推行条播条栽等重要决定，推动了农业的发展。1978 年粮食产量就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以后以每年 11%-13% 的速度增长。1981 年，全区粮食产量达到 6.4 亿公斤，比 1978 年增长 0.5 亿公斤。



杨善洲在观察水稻实验苗

当时，保山地委还作出了坚持“三个三结合”长期办粮食丰产样板的决定。即：“试验、示范、推广相结合，点、片、面相结合，

领导、技术、群众相结合。”“试验、示范、推广相结合”是指改良品种，培育优质品种，建立示范区。“点、片、面相结合”是指将试验成功的示范样板点的良种、良法向全区推广，又把推广情况反馈到示范点进一步改进。“领导、技术、群众相结合”是指从地委机关至县区都要成立工作组，建立示范样板，然后深入群众，带动群众，帮助群众落实丰产技术措施。当时，地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蹲点种



试验田，要有技术干部当参谋。时任地委书记的杨善洲在保山县板桥公社，施甸县保场公社都有个人样板田，施甸的李山头、姚关都有玉米样板地。

有位昆明农校毕业的高级农技师叫毕景亮，在板桥当技术员。杨书记每当到外地看到良种时，都要带回来给他们试验。杨书记时常利用周末、节假日到板桥样板点查看、询问，还亲自和技术员一起插秧。有几次他大年三十晚上



还到板桥看望。他对技术员说：“你们很辛苦，但是做着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解决了，保山的大事就解决了一半啦，苦一点是值得的！”1978年“京国92”



杂交水稻试验成功，他马上组织五县区的领导和群众到板桥参观学习。让施甸县委书记杨嘉宾亲自带队，组织保场、仁和、大楼等公社的二十多人参加板桥的收割。杨嘉宾他们实地参观学习后，干劲很大，回去抓得非常好。后来施甸大竹篷还出了个种粮能手、劳动模范段必宏。“京国 92”很快就在全区顺利推广。1978 年至 1981 年，保山的水稻单产在全省一直排在第一。1980 年引起了国家农业部的重视，全国农业工作会在保山召开。从此，保山地区获得了“滇西粮仓”的美誉。



我们自主当龙王

保山地处西南边陲，经济落后，农田水利设施薄弱，河道弯曲，泥沙沉积，历史上水患严重。1978 年遭受洪灾，泥沙淹没了大片稻田，严重的地方经过 3 年开挖才得到恢复。1981 年一场暴雨，5 小时下了 300 毫米，泥沙又掩埋了 1000 多亩良田，有的已经不能恢复，水利问题已经制约了保山的农业生产。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要破除迷信，过去靠天吃饭，现在我们要自己当龙王。”为了农业的发展，杨善洲号召全地区大兴水利建设。一是改直河道。杨善洲早在 1972 年就带领群众克服山势险峻、缺少



修筑三块石水库时用的碾子



机械、缺乏资金的困难，建成了龙陵腊勐的小浪坝水库、施甸酒房 367 隧洞、腾冲江南大队 15 公里大沟、昌宁珠山 45 处塘坝等一大批水利设施。1976 年他亲自带领技术员到施甸大河、保山河图大河、大沙河等县区的大河现场测量、规划，制定将五个县坝区的所有大河改直、扩宽的具体方案，到 1979 年，全区克服了历史上洪水泛滥成灾的局面，为保山地区几十万亩良田保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是建设水库。

1978 —

1980 年，

北庙、大

沙河、三

块石、响

水凹水

库、鱼洞



保山北庙水库

水库等数十个大中型水库相继建成，确保了全区的农业稳步增长，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年，杨善洲为了调研饮水水源的情况从旧城里嘎村



沿梁子沟走 10 公里来到出水洞。他用树叶子测水速，当时测到的速度是 4—7 米/秒。现在已用水管代替了水沟，潜池也提高了。已经可以供应两个村 9 个组 2500 人的饮水。

杨善洲来到龙潭寨，他看到龙潭寨缺水，村民没有水吃，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几次前来调研，都想不出解决的办法。最后杨善洲提议，用小水窖来解决村民的饮水问题。他请来了巧家县的师傅帮助建设，1986 年动工兴建，1987 年建成小水窖 6 个，每个装水 8 方，共计 480 方。解决了龙潭寨的饮水问题。





总书记盛赞杨善洲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于1980年和1986年先后两次视察保山，杨善洲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80年10月23日，胡耀邦总书记到保山来了，一下飞机就乘车直奔地委会，到了地委书记办公室，却没有见到书记……原来，当时一切保密，杨善洲只知道有中央领导要下来视察，至于谁来，什么时候来，乘什么交通工具，他也不知道，而那时正是栽种季节，他对板桥样板十分重视，把一切都安排好后，就到板桥公社的田间查看。等秘书把他从田里叫回来，他急忙到宿舍换了套他最好的中山

装，才出来见总书记。他的宿舍和办公室相连，他满身泥土的样子总书记亲眼看到了。再看看他这套虽然褪色但是很整洁的蓝布中山装，亲切地对杨善洲说：“像你这样朴实的地委书记不多了。”



胡秋邦同志和保山地委、军分区党委领导同志合影 1980.10.24

总书记在来之前就知道保山的粮食生产抓得很不错，就对杨善洲说：“不休息了，先到附近农村看看。”于是乘车到了板桥公社，当得知板桥公社的粮食单产最高到 850 公斤，个别田块甚至到了 900 公斤时，总书记高兴地说：“这产量很不错，在全国已领先了。”11 月 23 日，胡耀邦



总书记在各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讲话，他说：“云南保山县有一个板桥公社，粮食单产高，1700斤，确实是个好公社。”

1986年2月，胡耀邦总书记又一次到保山视察，一下飞机，他立即就询问板桥的发展状况，当得知板桥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50万元时，高兴地说：“250万元可以嘛，我很满意。”



做实事的人我敢用

工作 36 年，担任县、地区领导 24 年，杨善洲把后门关得紧紧的，从没批过一张违背原则的条子，从没打过一个“后门”电话。但杨善洲的前门总是敞开着的。地区农科所农艺师毕景亮的爱人 and 两个孩子都在农村，家庭比较困难。杨善洲在地委常委会上提出：“像毕景亮这样的科技



杨善洲参加会议讨论

干部，我们要主动关心他，尽快解决他的困难。不光是他，也要注意解决其他的科技干部的后顾之忧。”

杨善洲的大门还为那些德才兼备、年轻有为的人敞开着。除了开地区三千会这类特殊会议必须在保山城外，他几乎天天下乡，各县各区没有他没有到过的。他下乡只有秘书、驾驶员同行，也不提前通知当地干部，常常是他已经到田地上查看过了，深入群众中访问过了，才到县里、



区里。所以，人民群众对哪个干部不满意他一清二楚。

当年，杨善洲选择的接班人，41岁的黄炳生是全省最年轻的地委书记。他提拔的30岁的段兴祥是全省最年轻的县委书记，19岁的杨文虎是全省最年轻的公社党委书记。1979年12月24日，在全区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指出：“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如果选得不准，不仅达不到目的，相反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选好人才，关键在于识别人才，全面坚持党的德才兼备的任用干部原则。”

有人开玩笑说：“杨善洲同志‘后门’上的那把铁锁是没有钥匙的，但是他帮助干部群众解决困难的钥匙却揣了一大串，提拔为民办实事的干部的大门是敞开的。”



治穷先种树



昔日荒凉的大亮山

大亮山距县城约 44 公里，位于施甸县最边远的旧城、姚关、酒房三个乡的交界处，从南到北绵延 40 多公里，平均海拔 2400 多米，终年云雾缭绕，潮湿清凉。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时任保山地委书记的杨善洲就曾到施甸县的山区作过调查。当看到大亮山人民因粮食亩产低，便大肆毁林开荒、扩大种植面积，每村每年的开荒面积以 50 多亩的数量急剧递增的状况，老书记心情异常沉重。他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山不绿，地瘦薄，这是



山里人穷困的根子。要使山民富起来，不能不种树啊！”

他为什么认定只有种树才能消除山区贫困呢？

上世纪 80 年代，在杨善洲的带领下，保山所辖五县坝区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当时的保山被誉为“滇西粮仓”。坝区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杨善洲却又被另一个大问题所困扰：怎么让山区人民富起来？

他陷入了长久地思考，不停地寻求解决的办法，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有一次，杨善洲到保山市水寨乡的一个小山村里视察，他惊奇地发现，在这个山上种满了华山松的村子里，农民收入竟然比别的地方多出好几倍，而在他们的收入里，60%来自于林业。村民们造林的热情很高，还自发地成立了护林队。



又有一次，杨善洲到保山市海棠洼村检查工作，他了解到：海棠洼解放前的森林覆盖率只有 20%，现在森林覆



盖率达到了70%，那里的农民不种粮食只种树，却成了保山地区最早富起来的行政村。老百姓过年时每家都要杀两头猪，15岁以上的人都有一只手表(当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被称为家庭的“三大件”，戴手表是生活富裕的象征)。

这些村子的致富经验给了杨善洲极大的启示，那就是：山区老百姓只能靠山吃山，要治穷就得先种树。

困扰杨善洲多年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他很兴奋。他立即让秘书通知各乡镇领导来这些村子参观，学习经验。

从那时起，杨善洲开始对林业有了新的认识，他把林业工作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1983年，杨善洲徒步走了十几天，考察了保山地区的森林资源状况。1984年，他鼓励农民承包荒山，种植核桃、板栗等经济林，并多次召

开“多种经营会”。昌宁县以此为契机，发展成了“全国优质核桃基地县”。

1985年，保山地区第一个国社合作林场—观音山林场在昌宁县成立，这种由农民出林地国家来经营的新型林场，



使林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成为了可能。

1987年，杨善洲把全区三级干部会议的主题定在了林业上，会议期间，他带着干部从腾冲出发，一路看林，一直看到昌宁，最后在昌宁的西山林场结束了会议。



以杨善洲的坚毅的性格，只要是他认准了

的事，他一定得干出样子来。在考察途中，他想：改造荒山是我多年的夙愿，以前工作忙，无暇顾及家乡。如今退休了，我一定要回到家乡为改变山区老百姓生活做点实事。

时任保山地区林业局局长史记武最早知道杨善洲的心事，但史记武知道，到大亮山种树，可没那么容易。在那座贫瘠的大山上，连棵野樱桃都很难成活。于是他劝杨善洲：“老书记，你要想种树我在太保山划给你一片林地，那儿离保山近，条件也好一点，怎么样？”

杨善洲摇了摇头：“我要去大亮山！”



抉 择

1987年，中央提倡领导干部年轻化，干了近40年革命工作的杨善洲响应中央号召，也在考虑退下来了。对于杨善洲的退休，云南省委的意见是安排他到省人大工作。当时的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对杨善洲说：“老杨啊，你辛苦了一辈子，退下来后到昆明来吧！”杨善洲说：“我要是去昆明的话，买菜呀，生活呀，各方面都不方便。我在保山工作了一辈子，我已



经离不开保山了，我要回家乡，我要去大亮山种树！”

杨善洲的这个决定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但对于他来说，这个决定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他的夙愿。

是啊，他怎么忘得了大亮山呢？



他记得，当年母亲带着年幼的他在大亮山挖野菜、草药，挖了野菜、草药背到姚关去卖。用卖得的钱再买一些纸和笔，买一些日用品。那时的大亮山满山全是树，那时的大亮山多么慷慨多么富有呀！

他回想起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大炼钢钢铁”的口号下，家乡人民滥砍乱伐，使得昔日林深叶茂的大亮山变成了一座光秃秃的荒山，几乎每年都要发洪水，还会发生山体滑坡，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土地越来越贫瘠，山区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

他想到了住在深山里乡亲们，交通不便，生活极其困难，盖不起房子，娶不起媳妇，孩子辍学……他经常为自己当地委书记多年却无暇顾及家乡而深深自责。

“首先把荒山绿起来，才能让老百姓富起来！”杨善洲打定主意，要在退休后干一番大事业，带动当地百姓造林致富。

杨善洲要上大亮山种树的消息一传出，首先遭到了老伴和三个女儿的反对。老伴对他说：“你好好想想这些年你为家里做过些什么？你为公家辛苦了一辈子，你还苦不够？这些年关节炎、风湿病、胃病一齐来找你了，你就在



家清闲几年！”

女儿们轮流劝他：“爸，你已经都60岁了，别去种什么树了，在家享享清福吧。”

“爸，以前你在保山工作，和我妈不在一起生活，我们没意见，现在你退休了，无论如何也要多陪陪我妈。”

“爸，大亮山海拔两千多米，条件艰苦，你身体又不好，能受得了吗？”



不是杨善洲对女儿的话听不进去，他也知道多年来自己对家庭照顾不多，对不起老伴，对不起女儿。但大亮山荒凉的景象一直浮现在他的脑海，想到了山里的群众尚未脱贫，他毅然下定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家乡的大亮山。对于家里人，他只好暗暗在心底说一声：对不起！



火塘会议

1988年3月4日，一支特殊的队伍走进了大亮山，这支队伍有15个人，赶着18匹马，驮着一部电台，驮着一些粮食，驮着锅、碗、瓢、盆，驮着绳索、大刀、鸳鸯斧、镰刀、锄头、十字镐、钉耙等。

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个头戴竹叶帽，脚穿黄胶鞋，身着涤卡蓝中山装的老者特别引人注目，他个头不高，背着个行李包，瘦瘦的，精神却很好。他就是刚刚退休才三天的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



迎着初春料峭的山风，这一行人艰难的跋涉着，当天下午16时，他们终于到达大亮山腹地——张家大坪子。由于人员多，带的帐篷少，望着周围星星点点仅有些小灌木的荒山。杨善洲说：“同志们，人太多了，你们在帐篷里挤一挤，趁着天时还早，我就先搭个临时窝棚住吧！”他立即带领指挥部的同志们抡起砍刀，砍了些小树枝搭建了个



临时窝棚。他们埋下锅灶，草草地解决了一顿晚饭后，老书记便在自己的窝棚里，召开了到大亮山后的第一次会议。

夜幕降临，为了御寒，他们捡来了枯枝烧起了篝火，熊熊燃烧的火光映照着老书记矍铄的脸，也照亮了同志们的心。当晚的会议由杨光壁主持，杨善洲做工作安排。会议决定林场以“国社联营”的方式造林（对现有林木，林场与林区村社按2比8的比例进行利益分配，而林场成立后造的林按8比2的比例进行利益分配）。会议明确分工，把林场所有的人分成了三组，一组去给老百姓做宣传，签合同；一组育“百日苗”（在营养袋内培育100天左右，再进行移栽的一种育苗技术）；一组整百亩地（开挖整理1百亩苗圃地，确保造林1万亩的用苗）。此次会议为大亮山林

场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林场发展史上著名的“火塘会议”。





从此，大亮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杨善洲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他整天盘算着种什么树种、怎样种，带领同志们满山头跑。他在山上转了 12 天后，摸清大亮山的底，把能造林的地方都走遍了。后来，他又把人分成苗圃组、运输组，并确定要种一万亩速生松树林，今后每年扩建 20 亩苗圃，平均每年要种树一万亩以上。到 1988 年底，大亮山林场造林 1.2 万亩，超过原计划数两千多亩。

开展“百日苗”育苗期间，技术员对民工进行了一些技术辅导。“百日苗”育苗栽培技术当时在保山是头一家采用。在大亮



山百日苗移栽期间，杨善洲老书记随时背着工具亲临工地，对民工进行百日苗移栽技术监督和指导。后来，还在大亮山召开了“百日苗”现场会，并在全区进行推广。



扎根亮山

创业的路充满艰辛，但无论遇到任何困难，老书记和他所率团队改造荒山的信念从未动摇。老书记，这位永不退休的共产党员，始终像一面鲜红的旗帜高高地飘扬在亮山顶峰。

很多年之后，人们都还记得杨善洲当时的情形：他住在绿叶窝棚里，每天早上第一个起床，当其他人起来洗脸



劳动归来（左为杨善洲）

时，他在山坡上已经挖了几个树塘。这位脚上穿着黄胶鞋，脸上挂满汗珠的人俨然是一个山区的老农。后来，得益于省里的资金支持，老书记带领职工花了7000多元钱盖了40多格油毛毡房，一住就是9年。没有钱购买家具，他们就



地取材，自己动手做办公桌、板凳、床铺；没有电，他们就每人买一盏马灯照明。

1992年，林场终于在油毛毡棚的对面修起了一院砖瓦房。房子修好后，职工们首先想到的是杨善洲，可杨善洲死活不住。他说：“你们先住吧，我一个老头子住那么好的房子干什么！”最后他把房子让给了新来的技术员，自己

仍然住在原先的油毛毡棚里。床是用木桩和树枝搭的，门是用荆条编的，夏天



热，冬天冷，一碰上下雨更惨，被子往往要被淋湿。偶尔下山几天，连老鼠也跟他作对，常常将一条薄被子咬得到处是窟窿。从那时起到1997年搬出油毛毡棚，他在潮湿的棚子里住了9年多，关节炎和风湿痛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长期的劳累使这位老人的胃病加重了，他为了不耽误



工作，只好瞒着其他人，随身带着药片，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就偷偷地吃几片。

每年一到冬天，寒风刺骨，大家经常目睹老书记在恶劣的气候环境下干活，将双手弄得伤痕累累，手指头经常缠满了白胶布。林场工人劝他：“老书记，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开春又上来吧！您年纪大了，看您弄得满手伤痕，又有风湿病，您身体怎么受得了？”他微笑着说：“挺挺就过去了！”接着又伸出手说：“年轻人，学着点！如果手被弄伤了，一定要裹上胶布，这样挖锄头、甩大刀就不会震着伤口，手就不会流血了。”

1999 年 11 月，老书记手提砍刀修树枝时，不幸踩着青苔滑倒，右手严重划伤，左腿粉碎性骨折，半年后他



又执意爬上了大亮山。从此，他再也离不开拐杖了，但是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总是想尽千方百计解决，他像一棵青松一样扎根于此，再也没有离开大亮山。



麂子肉风波

有一天，大亮山林场的小杨出去巡山时，被当地的农民约去打猎，打到一只麂子，小杨将分到的一块肉带回伙食团。吃晚饭时，看着桌上的芹菜炒肉、红辣椒丝炒肉，杨善洲老书记夸这两个菜炒得好，吃得很开心。

吃过晚饭，大家围在火塘边烤火。小杨凑近去问：“老书记，今天的伙食怎么样？”老书记说：“不错不错，饿了有肉吃，冷了有火烤，是享福了！”



小杨又问“老书记，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肉？”老书记悠闲地说：“牛肉嘛，炒得不错！”“老书记，这是麂子肉，是我和村里人打的，分给我一块给大伙打牙祭！有我的一半功劳呢！”小杨高兴地说。这时，老书记严肃地说：“真是你打的！那好，你写一份检讨明天交来，再扣你一个月的工资。”接着，老书记对所有林场职工宣布：“以后不允许任何人打野鸡、野兔，谁打了就惩罚谁，也不允许吃野味。”



不能向困难低头

任何事物的发展壮大，总要遇到一些风风雨雨，艰难挫折，大亮山林场也不例外。在困难和问题面前，杨善洲总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迎难而上，毫无惧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同志们战胜困难。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同志们，不能向困难低头！没有困难，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

为了搞好多
种经营，他们办起
了茶叶基地，又建
起茶叶精制厂，茶
树也长得有半人
高了。但正在这



时，突如其来地发生了一场鼠患，一只只肥大的老鼠仅几夜之间就把三分之二的茶树都啃死了。大家辛勤多年的茶园毁于一旦。面对挫折，林场工人十分伤心，有的人畏缩了，但杨善洲却没有被困难压垮。他微笑着鼓励大家：“茶园毁



了可以重新种植，人的精神垮了，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同志们，我们要振作精神，继续与困难斗争！”

初建林场的3年，他们好不容易种活了将近3万亩华山松，但将近400多亩松树被一种叫紫荆泽兰的毒草侵扰死了。杨善洲又



鼓励职工不要泄气，振奋精神重新再干。他叫人在林场入口哨所房屋的墙壁上写了一行醒目的标语：誓把荒山变绿洲，欲叫瘠地流甘泉。在他的鼓舞下，林场职工始终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



大街上捡果核

大面积造林，苗木很紧缺，杨善洲常到芒市、昌宁、腾冲、龙陵等地买果苗。大亮山林场平均每年都要新种植一万余亩林地，林场职工人数也由开始时的 10 多人增加到了 40 多人，还聘请了临时合同工人 60 多人，与此同时，林场的各项支出也增大了，仅靠上级支持的资金根本不够，为了得到林场急需的果树苗，他



真是想尽了一切办法！

杨善洲要求多栽果树。他常对林场工人说：“我有能力带领大家创办林场，但是我没有能力解决大家将来的吃饭



问题，将来林场要与财政脱钩，现在要为职工们的吃饭问题打下基础，为了节约造林经费，就要在大亮山多种果树。”他多年来往返保山城、施甸县城和姚关街时，就在大街上



捡果核，桃核、杏核、李核……他一见就捡，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发现果核他就弯下腰捡起来，装进塑料袋里，带回大亮山培育果苗。他说：“捡果核不出本，省一分是一分。”

盛夏里的一天，恰逢施甸县城街天，他带着林场场长自学洪到施甸县城办事，办完事后，



他俩顾不得吃顿饭，顾不得炎炎烈日，像平时一样，匆忙地提着塑料口袋，跑到街上捡果核。当杨善洲挤过人群弯着腰如获至宝地捡起两枚杏核时，刚恰巧碰上他的一位老部下，那位老部下惊讶地望着满脸大汗的老书记说：“老书记，您怎么会跑到大街上捡杏子核？”杨善洲很坦然地说：“山上缺少树种，来街上捡点果核到山上育苗，能节约一点是一点。”此时，站在他身边，跟他一起捡果核的自学洪难过地背过身去。



原地委书记到大街上捡别人扔掉的果核，这在当时成



为轰动保山地区的新闻。可是杨善洲不在乎，林场资金紧，能省多少省多少。

“可您曾经是地委书记啊，在大街上捡别人

扔在地下的果核，大家会怎么想？”女儿劝导他。“那是他们的事，不花钱就能弄到种子，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他说。后来，他的女儿们也主动帮着他收集果核。

一次在万兴街上，杨善洲只顾埋着头捡果核，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小伙子的自行车，小伙子大发雷霆，用手指着他破口大骂。旁边有人赶紧过来把小伙子拉到一边，告诉他那位老人就是原来的地委书记。小伙子顿时怔住了，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毫不起眼的甚至有些卑微的老人会当过那么大的官。杨善洲却丝毫不理会旁边发生的一切，依然低着头只顾捡他的果核。



端阳花市是保山的传统节日，也是树苗、水果的旺市，街上的果核自然最多。每当这个时候，杨善洲除了布置相关人员购买急需的树苗外，他还发动全场职工跟他一起到街上去捡果核。当初的一个小小果核，现在已在岁月轮回中长成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果树了。



杨善洲的民间封号

杨善洲上大亮山植树造林，心中随时关注着身边的群众。随着林场的发展，他便开始了漫长的扶贫之路。他不断为附近的村子架电、引水、修路，做了大量亲民为民实事，当地村民感激地称他为“光明使者”、“活龙王”、“路神”。

1989年，在第一年的造林任务基本完成后，杨善洲开



始着手修建公路，他亲自用借来的水平仪进行测量，计算土

石方。在修公路时，由于没有专项资金，工价很低，每个土方仅有3角钱，工钱连伙食费都不够，有的民工坚持不住，就离开了。当时群众有些想法，老书记就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进行沟通协调，逐渐得到了群众的理解，14公里林



区公路就如期完工。为了维护公路，老书记将维修责任分摊落实到全场十五六个人，从雨季到冬季，老书记都在为这条公路的保通辛苦工作。

1993年，是杨善洲来到大亮山的第5年。看着当年种下去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幼林，看着这些树木茁壮地成长，杨善洲的心里比什么都高兴。因为他在一天一天地接近自己的理想，因为他在一天一天地实现着自己的愿望。

有一天，杨善洲把场长自学洪叫到了跟前说：“小自，我们上山已



经有几个年头了，树也种得差不多了，是不是应该给附近老百姓办点实事了？”自学洪说：“老书记，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我们一起干。”杨善洲说了两个字：“拉电。”

说干就干，杨善洲当了采购员，亲自到保山买电线，运电杆，自学洪和蒋从德负责勘察线路，架杆拉线。1公



里以外的大地山村成了大亮山方圆几十里山区中第一个通了电的村子，电接通那天，兴奋的村民们自发地筹钱宰了一只羊，敲锣打鼓地送到了林场。那天晚上，林场充满了欢笑，大地山更是一片欢乐的海洋，村民们笑呀，乐呀，跳呀，村民都感谢“光明使者”给他们送来了光明。



烤烟长势喜人

雷打树自然村土壤肥沃，蔬菜品质好，历史以来都很有名，但由于交通闭塞，靠人挑马驮行走数十里

山路出售，严重制约着这个村的发展。于是杨善洲多次跑到省上协调了资金，发动村民筹资投劳修通了连接黄泥沟林场 8 个自然村 20 余公里的公路。交通的便捷给封闭的村庄带来了新的文明，十多年来，雷打树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好几倍。到 2010 年，全村有摩托车 20 多辆，有十多户农民开上了拖拉机、农用车、微型车。村支书杨发富说：“老书记是个路神，没有他，我们雷打树就不会有这么大



的变化。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雷打树人从老到小都会记着他，感激他这位路神。”

摆田村绿场子原先也是一个很穷的地方，杨善洲就让村民到山上修了 2000 多立方米树枝去卖，用卖了柴火的钱买电线电杆给村子里通了电。村民们从电视上学了许多科技知识，他们把科学技术用到种烤烟上，种出的烤烟都卖了好价钱，全村家家修了新房子。

杨梅寨村水

平社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社，有 110 多户人家，他们做梦都想不到会用电。杨善洲多方筹集了 84000



元，给村子接了电。同时组织群众引来了山泉，解决了稻田、甘蔗地的灌溉问题。

大地山村村民以前磨面要到酒房街或者摆田村去，来回得花三天时间。电通了以后，村子里安起了 15 个小钢磨，



13户人家有了电视机，多半家庭修了新房子。人均收入从原先的不到400元增加到800多元。原来的光棍村变成了姑娘们争着嫁的地方，儿童入学率也达到了100%。

姚关乡瓦窑村由于多年缺水，老百姓生活非常



困难。杨善洲知道情况后多方奔走，请地区专家来搞规划。经过努力，瓦窑村家家户户用上了几辈人梦寐以求的自来水。老百姓都称他“活龙王”。

杨善洲以赤子之心来回馈家乡人民，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在家乡提起杨善洲无人不晓，无人不夸。那里流传着一首赞美他的民谣：杨善洲到了大亮山，修路接水把电架，植树造林富大家，党员本色永不褪，为民服务人人夸。



表 率

为了林场，杨善洲什么都舍得付出，但对自己的生活和家人却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到了大亮山上，尽管年事已高，又担任过地委书记的高职，但他却始终把自己摆在普通人的位置，干活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吃住也跟大家一起，从来不搞特殊。



一次，有个林场临时工和他一起干活，干完活才从别人的嘴里得知他曾经担任过

地委书记，他十分感动。他就一直悄悄地观察着老书记，当他看到老书记满身泥、满身汗连天在苗圃里干活时，他也忍不住了。他走到老书记身边，动情地说：“老书记，你都老了，还来大山上受苦，你干起活是那么卖力，听说你又不拿工资，还尽贴钱，穿的、吃的却都和我一样，你这是



为哪样？”说着眼圈都红了。杨善洲这种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形象，给林场职工树立了榜样，也在群众中树立了威望。

“正是因为有老书记带着干，我们才能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一步步挺了过来。”林场的工人说。

和杨善洲一起并肩战斗了13年的林场场长自学洪对杨善洲产生了极其深厚的感情。他感慨地说：“他最让人敬佩的就是以身作则。他经常讲，要求别人作到的事自己首先得做到，自己如果做不到，怎么去要求别人。所以，干什么事他都是站在最前面，种树他是主力，修路他是主力，扑火他也冲在前。有一次我们好说歹说把他从火线上劝了回去，他说：‘好，我回去值班吧。’等我们扑完火凌晨三点多回到场部时，他还坐在值班室里……”

作为大亮山5.6万亩林场的指挥长，在一般人看来，杨善洲一定很有钱。可只要林场的人都知道：杨善洲老书记无论下乡还是出差，他都是自己掏腰包，从来不拿林场的半分钱，也从来不会占公家的半点便宜。22年来，他从没开过一张发票，没报过一张单子，也没有报过一分出差费，就连他在修树枝时把腿摔断后所用的两千多元的医药



费都是自己掏腰包。无论谁和他一起出差，伙食都很简单，基本上就是三菜一汤。吃饭都是大家一起吃，然后伙食钱平摊。



杨善洲生活十分朴素，平时不喝酒，抽烟一般是自产的草烟，要买烟也是买最便宜的，比如一块八的“春城”，一块五的“中山”，还有保山烟厂自产的一块一包的“试制”烟。13年来，杨善洲只买过2套衣服，一套涤棉的，送给了他表哥，一件毛料的，是买了布找人缝的，上省城时才穿，场里人叫它“省城专用服”。

老书记不幸病逝后，林场职工在收集他的遗物时，无不悲痛万分，他们感慨地说：“都说叫花子搬家还有三担，而老书记连一担也没有！”



负责移交遗物的工作人员呈现的清单里记录着老书记的所有家底：一张单人床、一张学生桌、两个小坐凳、一



个火盆，火盆上架着一把被火烟熏得黑黝黝的烧水壶，旁边是用来煮药的两口小锣锅。一张自制的办公桌，桌上摆放着四个小碗，桌边放着老书记捡柴的小背篓，里面还有一把老书记

修剪树苗的

修剪刀。火塘

边的墙脚摆

放着雨伞、竹

叶帽、蓑衣、



马灯、小铁锤、砍刀、锄头、十字镐、钉耙。床头挂着水平仪、黄布帽、草帽、手套、袖套、围腰，床脚下放着一双解放鞋、一双翻毛皮鞋、一双拖鞋，墙壁上两张用旧了的洗脸毛巾，这就是老书记在大亮山留下的“宝贵”财产。



老书记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97年7月8日，大亮山林场职工朱家兴突然发病住进了县人民医院，治疗了几天，可是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日渐严重，肚子胀得像个圆球，而且伴随着剧烈疼痛。县医院给朱家兴家属发了病危通知书，实在无奈的妻儿在亲友的资助下，抱着一线希望把昏迷中的朱家兴送到了保山市人民医院。经检查，他患的是肝硬化，伴大量腹水，病情十分危重，市医院也发了病危通知书。家人六神无主，只是看着昏迷中的朱家兴痛哭不已，通知村里的亲属为他准备后事……

突然，老书记出现在病房门



杨善洲与职工亲切交谈

口，进来就焦急地问：“朱家兴的病到底危险到什么地步？”家人把病危通知书拿给他看，他二话不说，拿着就去找内科的熟人黄大顺医生。黄医生告诉他，朱家兴的病不是一

点没有救，但是要用一些进口特效药，价格高，看他们一家六口人都在农村，只有朱家兴一个人领工资，家里又没有什么产业，怕承担不了昂贵的医疗费。他当即对黄医生他们说：“只要对病人有用，要什么药尽快去调，我们这个工人苦够了，没有好好享过一天福，你们要全力抢救，不要怕，医药费我负责。”随后，他又去找护士长，希望她尽力护理好他。

医院非常重视，立即到昆明调回药，全力抢救。到第三天晚上，朱家兴苏醒过来，奇



84岁高龄的杨善洲同志最后一次安排布置林场的工作

怪地问现在在什么地方，妻子哭着说：“你在保山市人民医院，你已经昏过去三天了。如果不是老书记，你救不过来了，他中午还来看你了一次。”虽然还很虚弱，昏昏沉沉地，当时听妻子提到老书记为他的病从施甸大亮山跑到保山已经两次，朱家兴只觉得鼻子酸酸的，忧喜交加，忧的是老



书记 70 岁的老人了，却为了我这么一个小小的林场职工还在奔波。同时，又觉得十分欣慰，有老书记在，自己就有救了。

朱家兴在市人民医院住了两个月十一天，老书记总共去看了六次。朱家兴出院时，林场财务那里没有钱，老书记背地里向人借了 3 万元钱，亲自到市人民医院为他结账。

出院后，朱家兴请假在家调养，老书记又叫会计把每个月的工资送到他家里。

作为一个家庭困难的普通职工，在生命垂危的关头，是老书记用他的威望赢得了医院的信任，全力施救，朱家兴才捡回了一条命，朱家兴现在逢人就说：“老书记是我的救命恩人，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们一家子永远都感激老书记啊！”



丹心映碧岭

楊善洲功德碑

楊公，名善洲，雲南施甸縣人。原係山地委書記，一九八八年三月退休。公不戀地，值享受，婉拒赴省任職，安居之厚遇，毅然到貧困區，創建林場，植樹造林，誓把荒坡變綠洲，欲叫瘠地流甘泉。杼風沐雨，植樹造林，不憂艱苦，奮斗；山野路畔，覓樹苗，費盡心力，周折。種樹、修路，開言白眼；山草棚里，白手起家。大樹小樹，拾果核，不畏勤，二十載，碩果累累。如今天大亮山，亮色喜煞人；往昔凄涼地，今朝變綠洲。大路通四野，電燈照千家；山泉進農舍，致富人人夸。楊公雖有億萬富翁之羨譽，却兩袖清風。他愿用巨獎修繕林點，柳甘居狹窄小屋。安之若素，嘆苦若飴，只愿綠遍神州，春滿大地。

贊曰：善哉！義舉。洲綠水清，功德無量。偉業永存，李永和教授題。



饮水难题。林场现在承担着 3 个乡镇 11 个村委会 70 个村民小组 2.5 万人的饮水供给任务。从 2001 年开始，老书记争取资金 200 多万元，组织村干部发动村民筹资 10.6 万元，投劳 500 多人力，亲自参加建设，经过 4 年的时间架设了近百公里的水管，解决了雷打树村 8 个自然村 361 户 1553 人饮水问题，结束了人挑马驮的历史。



2010 年，云南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旱，让很多地方群众的饮水变得异常困难。可大亮山附近群众家里的水管却依然有清凉的甘泉流出。他们的水源地正是大亮山林场。大亮山周边的几个村，水源充足。农民该泡田时就泡田，该

栽种时就栽种，该收割时就收割，生产生活基本不受影响。群众还自发组织起来，送水到远处干旱的村寨。

2009 年 4 月，杨善洲非常平静地把自己用 22 年时间辛苦领办的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移交给施甸县林业局。有人曾算过一笔账：大亮山林场共占地 5.6 万亩，按



1 亩地种 200 棵树，一棵树按最低价 30 元计算，大亮山林场的活立木蓄积量价值已经超过 3 亿元。

2009 年底，保山市委、市政府为杨善洲颁发特别贡献奖，并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可是老书记却将其中的 10 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3 万元捐给了林场，3 万元捐给湾甸搞建设。2009 年 11 月 11 日，施甸县政府奖励他 10 万元奖金，他也坚决不要。



有人不理解他的做法，认为这些奖金对于老书记的贡献来说本来就是微不足道的补偿。可是他说：“我只是在尽一名党员的职责，只要活着，我就有义务和责任帮群众办实事，实在干不动了，只好把林场交还给国家，但这不是说我就退休了，有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还是要接着帮老百姓办，共产党员人讲的是奉献，我作为共产党人的身份永不退休！”



附：

杨善洲同志简历

杨善洲，男，汉族，云南省施甸县姚关镇陡坡村委会大柳水自然村人，生于1927年1月4日，逝世于2010年10月10日，享年84岁。

1934年至1949年，在家务农，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石匠。期间，1943年参加滇西抗战担架队支前。

1950年与张玉珍结婚，同年3月参加乡农会和武装联防队，任小队长。

1951年4月，在保山县第六区（施甸）摆马乡政府工作，任学习小组长。

1952年，经杨文伯介绍加入共青团。

1952年8月，在保山县六区（施甸）区委工作，任土改小组长。

1952年10月，调到保山县董官乡、打渔乡搞“土改复查”工作，任副队长。

1952年11月4日，经赵文桢、赵祖培介绍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53年1月至7月，在施甸区委搞“土改复查”工作，任队长。

1953年10月至1954年11月，在第五区（施甸）工作，任区委副书记。

1955年3月至1956年1月，在第五区（施甸）工作，任区委书记。

1956年6月至1958年8月，任保山县委副书记。

1957年3月至1959年7月，在中共四川省委工农干部学校中级部初中学习两年，获初中毕业学历。

1958年9月至1962年12月，任保山县委书记处书记，保山县委副书记。

1962年10月至1966年1月，在施甸县委工作，任县委书记。

1964年10月至1965年11月，在大理喜洲“四清运动”工作团工作，任团长、党委书记。

1965年11月至1966年2月，在保山“四清运动”工作团工作，任团长、党委书记。

1971年6月至1977年3月，当选为省委委员、任中



共保山地委副书记。

1977年3月至1986年3月，任中共保山地委书记。

1986年3月7日，任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8年3月8日，退休后忙于育“百日苗”，未开座谈会就赶到施甸大亮山植树造林。

1988年8月6日，从大亮山林场回地委参加退休座谈会，他不要退休证和光荣牌匾。

2008年11月11日，将义务领办的大亮山林场移交给施甸县人民政府经营管理。

